

【步履寻章】

我在山上挺好的

□闫红

最近这段时间,我总去爬山,我在山上感觉挺好。

借用时髦的说法,这一年,我成了一个被困在陪读房里的女人。小朋友升入高三,从午休生转成走读生,一天三顿饭像切吐司的刀,把我的时间切成一片片;又像三个锚点,把我的生活半径,锚在了陪读房附近。

陪读房这地方很魔幻,你耳中所闻目之所及,都和对面那所学校有关。坐在房间里能听到上课和下课铃声;站阳台上能看见学生上体育课;电梯里碰到的人,不是穿校服的学生就是陪读家长;走在路上你总能听到“我被我家的气死了”“某老师是大牛”这类对话。

像是一个封闭空间,空气里全是雾化的“成绩”二字。要命的是我家中等生的成绩神出鬼没,明明这次更努力,但题目没出到手里,一下子跌出几百名。那么能不能发个大狠,将可能考到的全部掌握?当事人笑了:你说的那种是学霸,你也知道不可能人人都是学霸。

总之只能看命。

DeepSeek说“习得性无助”,是“指个体在经历反复的失败或挫折后,逐渐感到自己对结果无法控制,从而放弃努力、被动接受困境的状态”,高三生本人和家长都很容易陷入这种状态。小朋友还被惯性与氛围推动着,像一只小蚂蚁般继续努力,她妈妈我却因为有更多闲暇,处于大片茫然中。

手头工作不少,但很难专注起来。又知道过度关注除了增加内耗外,没有一点好处,对于内耗的担忧遂转化成新的内耗。时时感觉到累,要到床上躺一躺。躺下来就更不好了,刷手机刷到想吐,放下手机的一刻对自己厌恶到极点。

有天听着小朋友把门关上,忽然很怕接下来的这大半天,然后听到一个声音对自己说,不如,爬山去?

就去了。

这座山我几年前经常来爬,原因是“山在那里”。

它离城太近,可以说就在城中,经常你一抬头,就能在鳞次栉比的缝隙里看到山影。

再就是它不太高,海拔两百多米。这个数字也不够直观,再说个数字,体质好的人,四十分钟能上下一趟,就我这种容易呼吸带喘的,缓步拾级一个小时也足够了。

我记得当年我总路过一棵树,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写着“白蜡木”,像是以前看过的剿匪片里,我方人员留下的信息,看到它,便知山顶不远了。我那时曾很浪漫地想,待我白发苍苍,这棵白蜡木会是什么样。有时候爬山的动力就是去看看我的对照组。

后来我忙起来,不怎么去爬山了。这一不去便很多年,和经常去一样自然。在这世上,“一念”也许是最有神力的事物。你看,正是这一念之间,我又来了。

这次我没有看到那棵白蜡木,它以前所在的位置有几个树桩,没心没肺地发着苍翠的芽,似乎说,你砍你的,我长我的。那场听砍,并不妨碍它们在每一个春天焕发生机。我无法从中认出那棵白蜡木,如果我再抒情一点,会觉得那半截树桩也认不出几年间颓了很多的我。还好我的抒情是间歇性的,这念头一闪而过,我又继续攀登了。

此后经年,爬山仍然是件很快乐的事。快乐在于有点难,又不太难。太容易了让人没有攻城略地的成就感,太难了会让人绝望。

山虽不高,也会让你爬到生无可恋。快吃不消时,抬头从树荫的缝隙里看到一线天光,知道那是来自山顶的光,前路不远,胜利在望,顿时觉得自己又行了。登顶(其实我有点不好意思用这么宏大的词)之后,一应痛苦,都像是快乐必不可少的铺垫。

若每一种磨难,都能这样必然地迅速地结束,谁还会害怕痛苦?可惜现实中大部分苦熬都是徒劳,无边无际的不确定中,我们更需要这样一个微型模拟,给自己补充点内啡肽,建立起对生活的信心。

另外山下的人跟山上的人也不太一样,不是说衣着打扮——爬这个山完全不需要装备。我甚至看到有些女孩像漫画女生那样穿着短裙,高跟鞋,白色短袜,挎着皮包,像是在逛街。

差别在于状态,山上的人普遍有一种“我都在山上了,还能怎么样呢”的状态。

就说那穿高跟鞋的姑娘,忽然崴了脚,尖叫声都特别悠长;带娃爬山的年轻父亲,鼓励孩子的话语,声情并茂,像影视剧对白;还有对面疾步下山的男子,高唱着“我的老父亲,我最疼爱的人。生活的苦涩有三分,您却吃了十分……”他是突然想起了他的老父亲,还是爬山锻炼了他的肺活量,让他要唱这么一首荡气回肠的歌演练一把?不得而知了。

似乎高海拔(虽然也没高出多少)制造出一种悬空感,让人觉得不必再和光同尘,稍稍夸张一点也可以,这个夸张,如一种戏仿,彰显出真实的自我。

我站在山顶,望着山下的灰茫茫的楼群,想起二十岁时的自己。那时我想象将来的生活,要去大一点的城市,在高楼上有个自己的房子,写作。现在这些都实现了,我还得到了我当时没想过的东西,一个我从未想过可以如此可爱的孩子。可是我并不觉得圆满。

可能所有的获得,都伴随着耗损。而这一刻,在山上,我感觉我是完整的。

山的高度,像是一种间隔,隔开日常。如果你决定经常去爬山,那么你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段,和其他时间隔开。是的,从那次之后,我就经常去爬山了。

在我规定自己要去爬山的那一天,很多事就不能再威胁到我。比如早起小朋友愁眉苦脸地告诉我,才刷出来的成绩又不尽如人意。放过去,我很容易被这事儿拽住,坠下去。但我等下要去爬山,有一个如此具体的事在那里,我就不会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一次“随堂练”成绩上。

爬山加上来回车程共计三个小时,这之前我要把其他事情搞定。我按照心中的清单,将当日任务一项项完成——不管什么事,立即去做就会容易一点。我感觉到对自身的掌控力正在恢复。

我一次次地去爬山,一次次地回来,想起很多更小的心愿随便放弃了,无从实现,更加感觉到念想的力量。我于是在心里给自己炖了份鸡汤,要求自己余生有更多良性的“一念”。

爬山是间隔,是抽离,是给逐渐失去弹性的生活,增加一点柔韧感,当然,它也能强身健体,是我疲惫之年全方位的自我救赎。我在山上,总觉得自己挺好的。

□杨曙光

得知周明老师辞世,心中好一阵难过。写作这篇文章时,有些诚惶诚恐,因为我与周明老师交往并不多,况且他又是文学前辈,而我作为晚辈和名不见经传的文学爱好者,不免有不自量力或附庸名家之嫌,因而犹豫再三,但终究还是耐不住心中的追思,所以迟至月余,才鼓足勇气写就此文,以此表达对先生的深切追思。

周明老师,祖籍陕西周至,1955年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。他是享誉全国的资深编审、著名作家、文学评论家,曾担任过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常务副主编,中国作家协会创联部常务副主任,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,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,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,冰心研究会副会长,《中国报告文学》杂志社社长等,并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。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涯中,他不仅自己创作了丰富的文学作品,而且还扶植了大量文学新人,并策划、组织、编创了大量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,其中徐迟享誉全国的《哥德巴赫猜想》就是他陪同作者三次采访陈景润后编辑发表的。作家贾平凹在悼念周明老师的文章中这样写道:“得知周明先生去世,我像被雷击了一样呆了半天,不觉泪流下来。先生是多么好的人啊,品德高尚,待人善良宽厚,是个君子。他一生为文学事业奔忙,有着独特的大贡献。他是文学的护花者,是文坛清流人物。陕西作家,包括我自己,差不多都受过他的指导和帮助啊。我们凡是上北京,也都联系他,去看望他,他是我们的依靠,是温暖,是一种力量啊。先生走了,他的文字还在,他的故事将流传。我们永远怀念他。”

我与周明老师相识于十二三年前。当时,济南市历下区作家协会为了承办好第六届冰心散文奖,作为时任作协主席的我,曾多次前往中国散文学会,请示和协调相关事宜。周明老师作为中国散文学会的副会长,每次都在百忙中亲自出面参与协商,使得我有幸与这位文学前辈近距离接触,并聆听指教。当年历下区作家协会与中国散文学会、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联合开展的文学活动,都有他老人家的指点和牵线搭桥。

我充其量就是个文学爱好者,可是,周明老师对待我这个晚辈的业余爱好者,可谓和蔼可亲,热情备至,丝毫没有前辈和大家的架子,这让我十分感动,倍感温馨,也让我从他身上领略了大家的风范,感悟到文学的魅力所在。

记得那时周明老师已经年过八旬,但他精神矍铄,思维敏捷,炯炯的目光和红红的脸庞,让我感觉他全然不像耄耋老者。他虽然话语不是太多,但有任何疑问,且言简意赅,不厌其烦。

周明老师与路遥、陈忠实、贾平凹等都是陕西乡党,因而相对而言格外熟悉。他给我们讲的故事,让我记忆犹新。他说:路遥创作《平凡的世界》时,曾累得几次虚脱。他的早逝与多年的体力透支和过度吸烟有很大关系。他还告诉我说:《平凡的世界》与很多世界名著一样,起初并不被某些刊物编辑看好,但名著就是名著,它不会被历史湮没。

周明老师曾来过济南,济南的泉水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。2014年,历下区作家协会在准备编辑出版《历下倾城》时,我曾冒昧地向他约稿,没想到老人家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下来。过后不久,他就给我们发来了《泉的济南很美》,我们也理所当然地把这篇优美的散文作为《历下倾城》的开篇之作。

“有许多去济南的理由,唯有泉水,对我的吸引力是最大的。”“百闻不如一见。天下的美景,若都能亲眼看一看,怕是看不过来吧。而这趵突泉,是必须要看的,原因在于它的奇。”“这奔涌的泉水,我是喜欢的,喜欢它那永不停歇的奔涌。我想,看到它的人,便自然脱去了他的情性、他的怯弱,就像这泉一样,勇敢地冲决出来,展示生命力。”“我叹服于自然的神奇,这奔涌了千年的泉,真的将一直奔涌下去?”“因为有了取之不竭的泉水,让人感到,济南这座城市都是水灵的,洁净的,舒爽的。”“济南的泉水成为济南的骄傲,也成为济南人向世人展示其风采的实力和资本。”

上述这些引文,只是《泉的济南很美》中几个段落的开头之语,但仅此而已,便足以感受到作者对济南由衷的赞美。这篇隽永、清新、精彩的散文力作,当是周明老师给泉城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。感谢周明老师,感念周明老师。愿老人家一路走好。

【朝花夕拾】

泉畔的追思